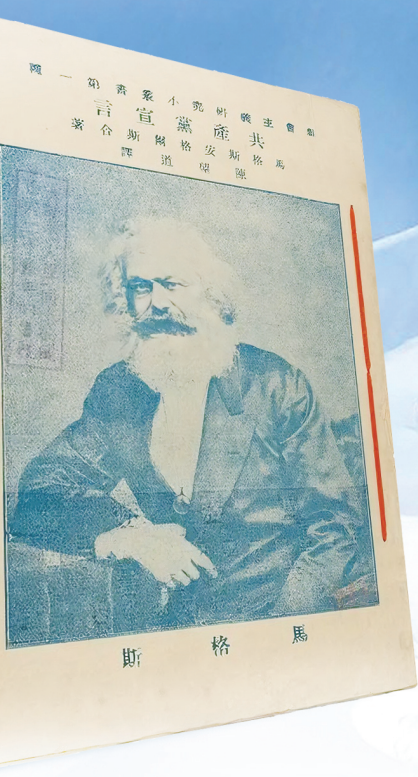


图为《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第二版封面



信仰的选择 辟一条光明的路

1919年冬天,一位当过师范学校国文教員,名叫陈望道的年轻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从寒冬到次年早春,他借着一盏昏暗的油灯,翻译了《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第一部《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两个月之内就印刷两次,迅即售罄,随后多处翻印,广为流传。正是这本28000多个汉字的小册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信仰故事的思想起点。

同样在1920年,李立三赴法国勤工俭学。因为师傅是法共党员,21岁的李立三从师傅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到学生运动和争取华工权利的斗争之中。1922年春节,李立三回家探亲。其父李镜蓉问他:“你留学回来准备做什么?”李立三回答:“我要干共产!”李镜蓉不知道,此时的李立三正在安源路矿发动工人大罢工。听了儿子的回答,父亲立刻暴跳如雷,“这纯属胡来!自己找死!人家督军那么多兵,那么多枪,就你们几个小娃娃?一千年也搞不成!”李立三答:“军阀有枪,我们有真理,有人民,我们死了不要紧,牺牲了一些人,一定有更多的人起来革命,革命一定成功!”后来,李立三成了中共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

与此同时,在广东海丰县,一个叫彭湃的青年,穿着从长工那里借来的破旧短褂,怀抱着德国产最新式留声机,给农民兄弟宣传他的信仰。这个出生在拥有1500多名佃户的大地主家庭里的富家子弟,却宣称“我即贫民”“我即制度的叛逆者”,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

1917年,21岁的彭湃带着祖父“谋官爵,耀门楣”的厚望出国留学,然而,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图书馆里,彭湃读到了《共产党宣言》,激动不已的他,感觉自己触摸到了救中国的真正良方。

1921年,彭湃学成回国。和其他留学生拿了张毕业文凭回来“谋官爵,耀门楣”不同的是,他心里装的是沉甸甸的信仰和理想。彭湃用一种最直接、最直达肺腑的方式,去冲破一个富家子弟与农民之间的隔膜:把自己分得的田契亲手送给佃户。佃户们不敢要,他就把佃户们召到家里,当面将一箱子田契、铺约一张张烧毁,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彭湃后来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中共早期的很多党员都出身地主或资本家家庭,但他们还是毅然背叛自己的阶级走上了革命之路,因为他们信仰公平和正义,信仰马克思主义,认为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毛泽东、周恩来、向警予、邓小平、叶剑英等,都是富裕或比较富裕家庭的背叛者。据说,瑞金早期的党员“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上犹党员八十多人,地主富农占三十多人”。有人对中共早期146位女党员做了分析,其中出身于中上阶层家庭者就有84人。如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是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1922年入党的陈碧兰,父亲为前清秀才,曾任武昌中华大学的学监及教授;向警予的父亲是长沙县有名的鼎盛场管事,后来任商会会长。

这些中上阶层家庭出身的中共党员,受过良好的教育,毕业后完全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职业,过上生活无忧的日子。他们为何甘冒风险加入这个主张“要替穷人翻身”的共产党呢?因为他们都选择了自己的信仰,坚信自己追求和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并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践行心中的理想。用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座右铭说,就是“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大浪淘沙 入党先要不怕死

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和平年代的人而言,多是严格的组织程序和庄重的宣誓仪式,而在战争年代,入党还直接关乎生命。据有关资料,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以查到姓名的革命烈士就达370万人。

1927年10月,在湖南酃县(今湖南炎陵)水口街叶家祠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并勉励千千万万的党员“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是什么样的初心,让一个最初只有50多人,且以青年人为主的组织成为时代的指引者,不断壮大并在转折的关键时期最终走向胜利?重温初心,守住初心,坚定革命前辈与先烈为之奋斗、不畏牺牲的信念和信仰,是本期策划的初衷。

初心不忘

陈建新

的阁楼上,一场6个人的入党仪式正秘密举行。“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主持这场入党宣誓的,是毛泽东。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让共产党人的队伍经历了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大的动摇与叛变。据陈独秀的报告,到1927年4月,全国共产党员达到57967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党员数量锐减到万余人,党的组织转入秘密状态。

大批领导人的被害,曾经使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从1927年至1937年,在上海龙华监狱殉难的革命者难以计数,其中有据可查的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和著名人士有近50人,包括彭湃、罗亦农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及柔石、殷夫、冯铿等“左联”作家。他们牺牲前,或受尽酷刑折磨,或被许诺高官厚禄,敌人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他们背叛中国共产党,但他们都毅然选择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信仰,而龙华监狱只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20余个关押杀害革命志士场所中的一个。

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因革命被捕,在俄国可以流放,如列宁曾被流放2次,布哈林曾被流放3次,托洛茨基曾被流放2次,斯大林曾被流放6次,然而在中国,因革命被捕则意味着生与死的抉择。杀戮没有让中国共产党人屈服,更多的共产党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捍卫和诠释了他们的信仰。比如,时任全国农协秘书长、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的夏明翰牺牲前写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比如,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周文雍临刑前在监狱里写下《绝笔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困境是一枚试金石,虽然有人在党最困难的时候选择了背叛,但是真正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者却在党最困难的时候选择了加入。“晚节全持好,堪为我辈师。救亡曾断指,入党在危时”,这是董必武悼念徐特立时写的一首诗。1927年4月,就在这白色恐怖之中,徐特立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这段历史,李维汉回忆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湖南处在白色恐怖之中。那时,我已卸湖南省委书记职务,但由于去武汉铁路不通,只得滞留长沙。其时,我得到黎向瑾掩护,住在离长沙城20多里的黎托,隐蔽在她家里,适逢徐老也逃出长沙住在她家。”李维汉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是徐特立的学生,后来同赴法国勤工俭学,又有同学之谊。因此,李维汉说:“我们师生在危难时刻相逢,特别高兴。黎家是个大地主,在他们的堂屋里当地的一些土豪劣绅相聚,弹冠相庆,叫嚣要把共产党杀绝。他们杀气腾腾的恶毒语言,不时传到我们住的房子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交换了对大革命的看法。我还问徐老愿不愿参加共产党?徐老对蒋介石、许克祥等镇压革命的反动行径非常愤慨,对工农大众深表同情。他在中国共产党遭到困难,革命处于低潮时,毅然提出了入党要求,我实在高兴得很,同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1927年7月间,徐特立在汉口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年过半百的知名教育家,在敌人狂叫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危险时刻,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给了在革命低潮中彷徨的人们莫大的鼓舞。

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不顾个人和家庭的安危,义无反顾地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还有身居高位的贺龙。1923年,时任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的贺龙问他的参谋刘达五:“我走的路子对吗?”刘达五答:“你常讲要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路子不对?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天下来,你也还在摸夜路呀!”

贺龙说:“你说对了。清朝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还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在四川打了三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四川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可是这么大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够收拾?”

在共产党人身上,贺龙看见了能够收拾这个摊子的力量。

1927年7月23日,贺龙率部到达九江。南昌起义负责人之一谭平山找贺龙谈话:“共产党人要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希望你率二十军一起行动。”贺龙当即表示:“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话,赞成!”7月28日,贺龙见到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周恩来就起义基本计划询问他的

意见。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起义部队南下途中,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朱德的执着找党一样,据说贺龙曾几十次(有说70次)找党。为什么作出这种选择?贺龙说,首先,“我看到共产党的主张好,能救中国”,其次,“北伐期间,周逸群等一批共产党员来到我的部队,我们朝夕相处,看了共产党的纲领、方针、政策,使我真正认识到共产党才是代表中国人民大众利益的。所以,我决心跟共产党革命到底!我拉队伍,干革命,就是想为老百姓谋利益。因此,在我的部队中,谁要想搞钱,升官发财,包括我的亲戚,我就让他走”。

此外,在白色恐怖的时刻义无反顾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还有叶剑英、彭德怀等人,他们都是为信仰和心中的理想而战。

苦难辉煌 长征中的担当与牺牲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开始的长征,是党史上一次生死存亡的转折,也是中国共产党继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经受的第二次严峻考验。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据统计,红军长征行程25000里,渡过24条河流,爬过18座大山(其中5座终年积雪),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在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频繁的行军作战中,共产党员做到了“两前两后”,即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进攻时,冲在最前面的是共产党员;行军中,负荷最大的也是共产党员;少粮时,把食物送到群众面前的还是共产党员;缺药时,把药品让给其他伤员的仍是共产党员。这种牺牲奉献精神,成为红军长征胜利的最重要条件。

在长征中,各党支部对党员的模范作用都有具体要求和具体的检查指导。在组织发挥党员模范作用时,还适应长征的需要,采取边行军边进行的方法,有时甚至是边战斗边进行。时任团政委的杨成武曾回忆:“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簇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更多的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天黑了,下起倾盆大雨,部队一天未吃饭,号召每人准备一个拐杖,拄拐杖,嚼生米,喝凉水前进。羊肠小道被雨水冲洗得像浇上一层油,三步一滑,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

在后人熟知的飞夺泸定桥战役中,参加突击队的共22名红军战士,均为共产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冲过泸定桥,幸存下来18人。对幸存的18名勇士的奖励,是每人一套列宁装、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这是那个时候,红军战士能得到的最高奖赏。

长征是付出了巨大牺牲的,红军营以上干部牺牲多达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等红军长征的队伍到达西北黄土高原时,一年前离开江西的战士仅十中存一。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时为86000余人,到达陕北后有7000余人。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时为14000余人,到达陕北后剩11000余人。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时为80000余人,到达陕北后剩37000余人,西路军远征失败后余14000余人。

其间,除了少数叛变革命方,无论是党的负责人还是红军将领,都是不畏牺牲的。无论是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刘伯坚的《带镣行》,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还是战场上牺牲的何叔衡、贺昌、邓萍、寻淮洲等35名师以上指挥员,都是用热血和生命捍卫信仰的丰碑。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战役,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从出发时的80000余人锐减至30000余人。湘江边7天的恶战,使红三十四师从8000余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虽然完成了掩护主力渡湘江的任务,但红三十四师也被敌人阻截在湘江南岸。最终,在数十倍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红三十四师全师尽没,师长陈树湘也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被俘。国民党士兵抬着受伤被俘的陈树湘去邀功请赏,途中,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伤口伸入腹部,抠出肠子,使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这个1925年入党,在长沙就与毛泽东结识的湖南人实践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时年29岁。

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主要指挥者方志敏、刘畴西等人在程家湾被俘。方志敏、刘畴西被俘后,蒋介石密令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尽力劝说方志敏、刘畴西“归诚”。特别是针对黄埔一期毕业、第一次东征在棉湖之役任教导一团第三连党代表的刘畴西,蒋介石命顾祝同一定要设法争取过来。在黄埔时,顾祝同既是刘畴西的教官,又是他的上司,但顾祝同怕自己说不动,又联络来更多的黄埔同

学,让他们帮助做工。于是从皖浙赣交界处的怀玉山到上饶,从上饶到南昌,押解方志敏、刘畴西二人的路上,来劝降之人络绎不绝,仅顾祝同本人就来了3次,但方志敏、刘畴西二人丝毫不为所动。1935年8月,方志敏、刘畴西被押往南昌市百花洲下沙窝刑场,英勇就义。

晚年的张学良也曾经回忆,当年和红军作战失败后,他曾经同部下讨论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他问自己的将领,谁能在缺衣少食、围追堵截中把这样的队伍带出来,而且依旧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和强悍的战斗力?还不早把人带跑光了?红军为什么打不散,散了还会回来,主要是共产党、红军信仰他的主义,甚至每一个兵,都信仰他们的主义。

今天,很多人都在思考:中国共产党为何总能排除万难走向辉煌?长征缘何走向胜利?是仅仅因为一些领袖式的人物吗?笔者想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信仰、不怕万难的革命精神、代表劳苦大众的方向宗旨、敢于牺牲的凌云壮志。

另外,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还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仅从1934年年底到1935年年底,有记载且较为重要的会议就多达24个。特别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永葆本色 凭什么走向辉煌

革命时期的延安,曾经是无数革命热血青年向往的地方。从1937年4月到8月短短5个月的时间里,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登记前往延安的就达2288人。从1934年到1945年,共有约80万人冒着连天烽火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中,“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以自己的政治主张、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希望,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当年访问过延安的美国人约翰·科林回忆说:“我被共产党人为目标奋斗的精神所感动,人们在空气中可以嗅到这种气息。”

精神在延续,“气息”在传承。在“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年代,张思德、刘胡兰、董存瑞、杨根思、邱少云、黄继光等英雄,为共产党人的信仰绘就了底色;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雷锋、孟泰、王进喜、时传祥、李改云、欧阳海、焦裕禄等无数典型,为共产党人的信仰构筑了精神高地;在与与时俱进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杨善洲、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等党员干部,为共产党人永葆先进、纯洁和公仆本色做了标杆和榜样……

1959年,48岁的科学家钱学森因为成为一名正式党员而“激动得整夜睡不着觉”。地质学家李四光在1958年入党的时候,已近古稀之年,但他却说自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生命的新起点刚刚开始”。数学家华罗庚1958年就申请入党,当1979年获得批准时,他在一首词中表达出这样的心声:“横刀哪顾头倾白,跃马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1982年9月,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陶铸岳以90岁高龄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年龄最长的新党员,他激动地喊出了“伟哉共产党,追随幸有缘”的心里话……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文革”以来的错误思想,真正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践再次证明了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的优越性,确保了党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下都能克服自身的不足,并最终走向辉煌。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初心常常被遗忘,正如诗人纪伯伦在《先知》中说的:“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20世纪90年代,习近平在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时引用的东汉刘桢的诗句:“驰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沉迷簿领间,回回自昏乱”,足以让我们体会到总书记的“初心”,这就是念兹在兹的家国情怀、夙夜在公的精神状态和“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责任担当。

“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地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康德所说“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对共产党员来说,就是“忠诚与信仰”“性质、宗旨和本色”,这既是党员干部的共同初心,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辉煌的关键所在,更是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

图为毛泽东同志带领6名党员举行入党宣誓仪式的叶家祠阁楼

